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译丛主编 鲁路


# 阿多诺

ADORNO



[德] 格尔哈特·施威蓬豪依塞尔 著  
(Gerhard Schweppenhäuser)

鲁路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译丛主编 鲁路

# 阿多诺

ADORNO



[德] 格尔哈特·施威蓬豪依塞尔 著  
(Gerhard Schweppenhäuser)

鲁路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多诺 / [德] 施威蓬豪依塞尔著; 鲁路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ISBN 978-7-300-09470-0

I. 阿…

II. ①施…②鲁…

III. 阿多诺, T. W. (1903~1969)-哲学思想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9796 号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阿多诺

[德] 格尔哈特·施威蓬豪依塞尔

(Gerhard Schweppenhäuser) 著

鲁路译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7.25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0 000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目 录

第一章	变换方式弥补童年的尝试 .....	1
第二章	批判 .....	17
第三章	理性的自我批判 .....	29
	特定的否定 .....	32
	启蒙的双重特征 .....	41
第四章	对无望者的拯救 .....	59
	从拯救立场出发的哲学 .....	59
	客体的优先性 .....	65
第五章	彻底社会化了的社会 .....	86

	社会的概念 .....	87
	个体的消除 .....	97
第六章	获得解放的社会的目标 .....	115
第七章	美的孱弱乌托邦 .....	140
	摧毁与拯救艺术 .....	143
	音乐的沉寂 .....	156
	从音乐过渡到认识 .....	167
第八章	文化的败落 .....	176
	极其可怜与有罪的文化 .....	178
	欺骗大众的启蒙 .....	189
附录	阿多诺年表 .....	216

阿

多

诺

## 第一章

# 变换方式弥补童年的尝试

1949年，法兰克福的大学生们对于他们那位刚从流亡中归来的教授还知之甚少，顶多有些熟悉内情的人知道，此人曾经为流亡加利福尼亚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写作其新近出版的小说《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提供过帮助。泰奥多·路德维希·维森格伦特-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Adorno）于1903年9月11日在法兰克福出生。托马斯·曼在记述《浮士德博士》的成书过程时讲述阿多诺说：“他的父亲是位德裔犹太人。”这位奥斯

阿

多

诺

卡·维森格伦特 (Oscar Wieselgrund) 是法兰克福的大酒商，曾改宗新教；“他的母亲是位歌唱家，是一位出身科西嘉的法国军官与一位德国女歌唱家之女”，这就是玛利亚，娘家姓卡尔维利-阿多诺·德拉·皮亚纳 (Calvelli-Adorno della Piana)。“阿多诺使用自己母亲出嫁前的姓氏，是个矜持冷淡、敏感伤情、清高孤傲的人，近似于被纳粹迫害致死的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本雅明留下了一部《论德国悲剧》 (*Deutsche Trauerspiel*)，即论述比喻手法的哲学及其历史的书。”“阿多诺成长于一个理论 (包括政治) 与艺术 (尤其是音乐) 兴趣极其浓厚的氛围中”<sup>[1]</sup>，作为一名年轻人就在主张自由主义的法兰克福令人刮目相看地产生了精神性影响。如果说他的幸福童年和青年时代曾笼罩过一层阴影的话，那么就是他这位天资得天独厚的人可能受到过才疏学浅的同学的妒忌。后来，在《最低限度的道德》 (*Minima Moralia*) 中，他将这些“怀有恶意的同学”称为法西斯主义的“信使”。<sup>[2]</sup>这一类经历成了他强烈厌恶“随大流的同一性”的心理基础，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他就在以革新性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这种“随大流的同一性”。

阿多诺从年龄更长的友人、《法兰克福报》

(*Frankfurter Zeitung*) 著名小品作家齐格弗里特·克拉考尔 (Siegfried Kracauer) 那里受到了哲学训练：“多年来，一般是在星期六下午，他同我一起阅读《纯粹理性批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从这本书里比从学校老师那里获益更大。”<sup>[3]</sup>

阿多诺做学生时就是个富有激进的现代精神的、影响广泛的音乐评论家了。最初，他倾心在法兰克福上演过一些作品的勋伯格 (Schönberg)。21岁时，阿多诺在汉斯·孔内利乌斯 (Hans Cornelius) 那里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结束了哲学、音乐理论、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的学习。孔内利乌斯也是马科斯·霍克海默尔 (Max Horkheimer) 的学术指导老师和启发者，霍克海默尔后来做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人。1925年，阿多诺前往维也纳一年。“这个引人注目的人一生都拒绝在哲学与音乐之间做职业上的抉择，”托马斯·曼写道，“他非常清楚，自己要在这两个彼此不同的领域中并驾齐驱。他的辩证性思想方向与社会、历史哲学倾向同他对音乐的酷爱交织在一起。学业服务于对音乐的酷爱……在维也纳，他在阿尔班·贝格 (Alban Berg) 与爱德华·施托尔曼 (Eduard Steuermann) 那里作曲、弹钢琴。



1928年至1931年间，他做《维也纳破晓》（*Wiener Anbruch*）的编辑，从事激进现代派音乐工作。”<sup>[4]</sup>回到法兰克福后，他同社会研究所联系更加密切，他同该所所长霍克海默尔上大学时就有着共同的理论兴趣。

后来，值霍克海默尔70寿辰之际，阿多诺在一封《致马科斯·霍克海默尔的公开信》（*Offener Brief an Max Horkheimer*）中写道：“我最初在阿德马·格尔普（Adhemar Gelb）主持的心理学专业研讨会上见到你时，你比我年长八岁，几乎没有把我看作大学生，而是将我看作一个年轻的富家子弟，对科学显示出一定的、旁观者的兴趣。你没有沾染学者那种职业上的畸形特点，即很容易将学问同实际混为一谈。你讲的话是如此明智、敏锐，尤其是如此具有独立性，以至于我很快就感觉到，你在专业领域已绰绰有余，而你却妄自菲薄地觉得自己未登堂入室。”<sup>[5]</sup>

研究所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研究市民社会的自我解体过程的成因，据说就是这一过程导致德国成为独裁国家的。为了理解受统治者为何违背自身利益屈服于统治，并认同这种统治，霍克海默尔的批判理论将马克思的观点同一种进而发展为社会心理学的心理分析联系起来，着手将当时在德国尚不为人所知的经

阿

多

诺

验性社会研究纳入自己的各项研究中。在霍克海默尔的研究所，哲学的任务是，将瞄准这一事实情况的、跨学科的、有相当部分是经验式的研究系统地组织成一种关于姗姗未至的社会变迁的唯物主义理论，以便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促成社会变迁。在这个圈子里，除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莱奥·莱文塔尔（Leo Löwenthal）、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与其他人外，阿多诺作为音乐理论家致力于一种有关社会整体过程的、跨学科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他将艺术作品同时理解为独立的创造物与社会的特定产品，为了理解艺术作品的双重特征而研究音乐的社会内容。而他发掘音乐的社会内容，不是外在地采用社会学的方式，而是分析作品本身的审美形式法则。<sup>[6]</sup>阿多诺对音乐做了内在分析，对音乐的传播、接受及创作的社会条件及其影响做了音乐社会学研究，并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因而能够从他的音乐专业领域出发，获得对社会整体的认识。同时，他受到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与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的启发，同自己的老师兼友人瓦尔特·本雅明进行富有创造性的交流，在关于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授课资格论文中阐述了哲学的社

会性内容及其潜在的批判性内容。<sup>[7]</sup>

后来，阿多诺讲述自己自1923年起通过克拉考尔结识本雅明那段时日说：“本雅明在法国生活的那段日子里，我经常见到他，我想说，每周至少一次，或许更频繁。后来，不仅在他数次造访这里时，而且尤其是在他造访柏林时，也很定期与频繁……当时我很年轻，他至少比我大11岁，我自认是个受教者。我知道，自己极其着迷地听他讲述，有时提些相关问题。他那些发表前就交给我的作品，我马上就能看到。”<sup>[8]</sup>

1931年，阿多诺取得授课资格，托马斯·曼还讲道：“他在法兰克福大学做编外讲师，教授哲学，直至被纳粹赶走。”<sup>[9]</sup>此后，他先是试图在德国“冬眠”，同时尽力在牛津寻找一个学术落脚点。直至1937年，阿多诺都定期从牛津回法兰克福做较长时间逗留。1938年，刚开始时的各种误解与麻烦过去后，他才被吸收进社会研究所，做固定工作人员。<sup>[10]</sup>同年，他与取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妻子玛格雷特·卡普露斯（Margarete Karplus）一起流亡美国。“自1941年起，”托马斯·曼讲，“他居住在洛杉矶，几乎同我们是近邻。”<sup>[11]</sup>他在那里才改名为泰奥多·维·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阿多诺始终属于研究所最密切的圈子，与研究所的合作肇始于流亡时期，最初是在纽约，后来在洛杉矶。这使得阿多诺涉猎广泛，但也具备了在美国生活的特定经历。他虽然从未满足于这种生活，但也对此心存感激：“在美国，我不再天真地崇拜文化，而获得了外在地审视文化的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我虽然从事社会批判，充分意识到经济的优势力量，却天生觉得，精神理所当然具有绝对的意义。至于这种理所当然的情况并非不言而喻，这一点我是在美国才明白过来的。那里的人并非对所有精神事物肃然起敬，就像在中欧和西欧，人们超然于所谓的知识阶层之上一样。这种肃然起敬诉诸阙如，则促使精神做出批判性反省。”<sup>[12]</sup>对于阿多诺同样重要的是“对民主的形式这一实质的体会，这些形式在美国已渗入生活。而至少在德国，它们一向不过是形式上的游戏规则。我担心的是，它们越来越连游戏规则都算不上了”。他将这种社会经历归结为一个概念，而这一概念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阿多诺流亡前就成为他的核心概念了。这就是现实人道主义概念：

在那里，我认识到现实人道主义的潜力，而这一点在旧欧洲几乎是看不到的。民主的政治形

阿

多

诺

式非常贴近人。美国的生活尽管匆忙得令人抱怨，但它独具和平、善良、慷慨的特点，这种特点在诸如德国 1933 年至 1945 年泛滥成灾的种种恶意与敌意的反衬下，愈发突出……在德国的社会学研究中，人们总是一再听到接受测试者说，我们还未成熟到胜任民主。而在据说年轻得多的新世界，很难想象有人做出既有统治欲又自轻自贱的这类表露。我并不想借此声称，美国已避免了转向集权统治形式这样一种危险。

对此，阿多诺在《独裁性格研究》（*Studien zum autoritären Charakter*）中借助经验性社会研究做出了证明：“这样一种危险的确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中，但抵抗法西斯潮流的力量在美国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强大，或许除英国外。”<sup>[13]</sup>

借助于批判相对于欧洲乃至世界大众文化产业具有领衔作用的美国文化产业<sup>[14]</sup>，借助于 1950 年在美国出版的那本划时代的《独裁性格研究》<sup>[15]</sup>，阿多诺在流亡期间加深了对民主社会自身矛盾的认识。在阿多诺看来，文化的内在矛盾在于，它许诺的人道主义建立在无人道的、压抑人的社会形态基础上。最终，当它作为文化产业而完全遵从商品生产规律时，它自

身就变了样儿。因此，恰恰是在民主国家研究独裁特征，这并非仅仅是一种受制于生活条件的偶然情况。《独裁性格研究》首次对民主社会自我侵蚀的倾向做出了经验性的、社会心理学式的分析，它揭示出，个人具有哪些气质特征才“尤其容易接受反民主的宣传”<sup>[16]</sup>。

在美国，阿多诺不仅参与写作托马斯·曼那部具有音乐审美灵感的《浮士德博士》，他还撰写了《试论瓦格纳》(*Versuch über Wagner*)<sup>[17]</sup>与《新音乐哲学》(*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sup>[18]</sup>。《最低限度的道德》以及他同霍克海默尔共同撰写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也是这一时期诞生的。1949年，阿多诺还同霍克海默尔一道返回法兰克福。后来，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人们问他为何回来时，他提到“自己精神的连贯性”以及自己的思想辩证地扎根于德国哲学传统的情况，提到“我可以娴熟运用的语言，至于英语，我在流亡的多年间，顶多是像其他人一样，在学习书写”。他还提到，在家乡他感觉摆脱了市场与公众舆论的压力。他强调说，如果有人把他的思想归纳到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特征上去，而正是由于这种特征，有关集体罪责的构想才是有问题的，

阿

多

诺

那么他认为这种归纳落后于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与经济条件的认识，它本身就属于那种“造就了法西斯”的精神氛围。他认为，应当在有自己具体的生活史经验的地方从事批判理论研究。他知道，不能将“从自身思想起源中形成的、对自身思想起源保持的连贯性与忠诚的意义”混同为“执著于往昔的高傲自大、顽固不化。这种忠诚意味着，宁愿在自身经历的核心处做到有所转变，也不因另一种氛围之故而放弃自身的希望。我就是想回到自己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而这样做最终是出于一种感受，即一个人在生活中所实现的，无非就是变换方式弥补童年的尝试。我并未低估自己所做决定的危险与困难，但至今我也未懊悔这一决定”<sup>[19]</sup>。

自1949年起，阿多诺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专业与音乐社会学专业编外教授，7年后转为正教授。他同霍克海默尔一道负责1950年重建的社会研究所。20世纪50年代，该所促成批判社会学在联邦德国异军突起。

20世纪60年代，阿多诺成为年轻的联邦德国最重要的一名批判型学者。1963年至1968年，他任德国社会学协会主席。他的文集《棱镜、介入或提示》

(*Die Prismen, Eingriffe oder Stichworte*)<sup>[20]</sup>的影响远远超出学术圈子。他在电台与报刊上被称为措辞尖锐的启蒙者。例如，他曾激烈地主张，要将性犯罪法制定得更加自由化。<sup>[21]</sup>

阿多诺认为，最迫切的是要同一种遗忘现象作斗争，这种遗忘现象以“克服历史”为名义，力图铲除那些妨碍在“规规矩矩的社会”（路德维希·艾哈特语，Ludwug Erhard）中致力于重新建设与创造经济奇迹的最后障碍。“阿多诺在一生的最后 25 年关注着纳粹的苟延残喘，”德特勒夫·克劳森（Detlev Clausen）写道，“意识到奥斯维辛存在于今天，就意识到回顾是必要的。他没有追踪现实，而是让许多人得以借助他的思想努力来形成经验。”<sup>[22]</sup>这起到了效果。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此时人们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抗议运动的指导者而备受世人瞩目。随后几年，反越战游行、“公社一号”（Kommune 1）行动等等都影响了联邦德国的政治氛围。不久，人们就清楚了，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这一点上，阿多诺同抗议运动有契合之处，但在争取变化的手段上，阿多诺却同抗议运动分道扬镳。阿多诺公开支持学生抗议活动的倾向，这种倾向的目的不仅在于改革大学，而且导向同纳粹进



行社会斗争。阿多诺认识到，在议会外形成一个反对派，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他支持抵制紧急状态法，宣称学生封锁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出版社（Axel-Springer Verlag）运出报纸是合法的。但与赫伯特·马尔库塞不同，阿多诺拒绝任何形式的过激行为和暴力行为，因为他认为，这些行为会非法地以革命行为自居。这些行为唤起阿多诺对前法西斯主义反民主潜力的回忆。他去世前不久接受过一次报刊采访，陈述在联邦德国实行激进民主政治的可能性时说：“关键性的分歧在于，在现有社会与技术条件下，改革性实践只有是非暴力的、完全符合基本法框架的，才是可以设想的。”<sup>[23]</sup>

在最后这几年间，阿多诺的哲学研究专注于他的晚期著作《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1966年）与《美学理论》（*Ästhetische Theorie*），后一著作未予完成，于1970年作为遗著出版。许多人不喜欢他在政治上不合作的态度。或许，这一时期闹事的大学生妨碍了他的教学工作，因而令他不知所措；或许，学生们误导他做出了错误判断，如他在1969年由于担心法兰克福的大学生占领社会研究所而叫警察来帮忙；此外，有人掀起一场反对他出版瓦尔特·本